

第9卷第1期 2016年2月

Vol. 9, No. 1, February, 2016

国际高等教育

关键趋势

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之路.....	1
为何要教育国际化?	4
21 世纪的国际化: 融合高校政策与领导力.....	6
科研领域的“国际学者”和“本地学者”: 欧洲相似的生产力模式.....	9
确保背景相异高校间合作的公平性.....	11

课程国际化

国际化、课程设置与学科.....	13
欧洲呼声: 本土国际化的新定义.....	15
澳大利亚: 课程国际化和“新常态”	17
教师与国际化参与: 国际化已改变了学术工作?	20
为国际学生建立一个包容性社区.....	22

国家发展

沙特学生的对外流动: 对国家、学术水平和研究领域方面的综述.....	24
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6
日本学生出国留学新趋势.....	29
德国高等教育协调的国际化: 广阔视角.....	31
印度作为区域教育中心的崛起.....	35
法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 历史概览.....	39

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之路

Hans de Wit, Fiona Hunter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前任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Fiona Hunter: 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箱: fionajanehunter@gmail.com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 但作为一个概念, 它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在过去 30 年中, 欧洲关于研究和教育方面的项目, 尤其是“伊拉斯谟项目 (ERASMUS)”和“玛丽·居里奖学金项目 (Marie Curie Fellowships), 一直助力发展更广泛且更具战略性的途径以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 并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及院校树立了榜样。高等教育国际化已受到经济和社会全球化以及日益增长的知识重要性的影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理据的组合不断变化, 驱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这些理据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不同高校和项目中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毕竟, 没有哪一种模式能够适合所有情况。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多种多样, 且不断发展变化, 高校之间亦是如此。

欧洲议会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进行了一项研究, 这是由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与国际大学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欧洲国际教育协会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合作开展的项目, 包括 17 个国家 (十个欧洲国家与七个其他地区的国家) 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 我们探讨了当前国家战略中的主要趋势, 以及欧洲高

等教育国际化未来的主要趋势。

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十大重点发展趋势如下:

(1) 国际化的重要性在所有层面日益增长 (涵盖更广的活动范围, 更具战略性的方法以及新兴的国家战略和愿景);

(2) 高校开展国际化的策略增多, 随之而来的是风险的增加, 如同质化、局限性——只侧重于定量结果;

(3) 各国各地区面临的资金压力不断增加;

(4) 通过创收,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私有化趋势增强;

(5) 受全球化竞争压力的不断影响, 愿景目标趋同, 但并未付诸于行动;

(6) 从 (只有) 合作到 (更多) 竞争的一个明显转变;

(7) 新兴区域化, 其中世界上最典型的区域化例子就是欧洲;

(8) 世界范围内国际化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人数不断上升, 随之而来的是数量与质量的挑战;

(9) 在进行对比分析和决策制定时, 缺乏足够的的数据;

(10) 同时也不断涌现一些新兴领域, 尤其是课程国际化、跨国教育和数字化学习

等方面。

显然，在欧洲，作为战略过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随着伊拉斯谟项目的启动而拉开序幕。该项目为大多数国家的国际化创造了共识和驱动力量，之后在“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中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和机构层面，特别是在欧洲，国际化正成为主流。这些国家的外交辞令中虽包含了更全面且富有战略性的国际化政策，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是在欧洲——该地区被视作国际化最佳实践案例——也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而且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化程度参差不齐，在南欧、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地区，国际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国际大学协会和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开展了两项关于欧洲和世界国际化的调查，这两项调查为欧洲描绘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图景。此外，国际大学协会的调查显示，欧洲是世界其他地区院校国际化活动中最常被优先考虑的地区。

未来图景

由世界各地国际高等教育领域专家组成的德尔菲调查小组（Delphi Panel）肯定了欧洲的发展趋势并描绘了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图景。这一图景把高等教育国际化视为一个不断发展以应对全球化的策略，它受到一系列理据以及越来越多利益相关者的驱动。虽然该图景预计人才流动和跨境教育将会继续增长，但它呼吁更应注重课程和学习结果，以确保实现面向所有参与者的国际化，而不只是少数流动人群的国际化。该图景认为各种形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和联盟对教育和科研的作用日益重要，并指出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支持高等教育国

际化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可避免的是，还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这主要与资金和管理上的局限有关，也与院校的语言能力问题和学术参与及奖励的性质有关。同样，也存在着推动力量，如：技术、更有力（同时也更平等）的合作、对质性结果的更多关注、公私立院校合作项目的推进、教育和科研之间以及不同教育层次之间更多的一致性。

该图景假设，如果障碍清除，推动因素被激活，欧洲高等教育将会崭露头角，培养的毕业生将会成为全球公民和全球专业人士，促进欧洲各地区更好的竞争与合作。

重新定义国际化

作为德尔菲调查小组调研的成果，这项研究已把简·奈特（Jane Knight）广为人知的“国际化”定义修改为“一种有意识地将国际、跨文化和全球视角纳入教学目标、功能和高等教育的过程，以加强所有学生和教职人员的教学和科研素养，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该定义反映出人们日益认识到国际化应减少精英主义，更具包容性，我们不仅要关注流动性，还要更多专注于课程和学习结果。“跨国”部分（流动性）需要成为国际化课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确保实现所有人的国际化，而不只是少数流动人群的国际化。新定义再次强调了国际化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提高质量的手段，它不应只关注经济理据。

包括欧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战略，仍主要集中于流动性、短期和/或长期经济收益、招聘和/或培训有才华的学生和学者、国际声誉和知名度。这意味着我们仍需更加努力，将这些方法形成更全面的战略；其中，课程

和学习结果作为国际化的途径，以提高教育和研究的质量，应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本土国际化”是欧洲委员会发布的国际化战略——《世界图景中的欧洲高等教育》（*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及几大国家战略中的第三大核心，它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在整个欧洲以及欧洲各国，尤其是院校层面，都需要更具体的行动使其成为现实。

欧盟和“博洛尼亚进程”在欧洲和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不可否认，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关键要着眼于伙伴关系与合作，认识并尊重环境、需求、目标、合作利益以及当前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差异。欧洲只是国际化的范例之一，

它也可以从其他地区学习经验；它提供的只是一个重要的模式，但并不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唯一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前途光明，但要想获得进一步积极发展并扩大其影响力，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都必须就相关理据、效益、方法、机遇以及前进中的困难维持公开对话。同时，我们不能忽视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正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如金融危机、不利的人口趋势、移民、种族和宗教的紧张局势等。虽然这些挑战意味着某种威胁，但它们也有利于加强我们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重要性的认知。

为何要教育国际化?

Robert Coelen

荷兰斯坦德应用科技大学 (Stend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高等教育国际化教授

电子邮箱: robert.coelen@stenden.com

在院校和学术项目中, 尽管国际化活动已有很长历史, 但许多教师仍在纠结他们的课程或项目是否有必要国际化。国际化的学习结果应包括跨文化有效性, 而且, 鉴于全球化来势汹汹, 人口大量迁移 (根据联合国数据, 2010 年全球迁移人口约有 2.1 亿); 因此, 那些直接负责教学的教师竟会质疑提供国际化教育的必要性, 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

新世纪以来, 全球商业领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此之前, 《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的管理本部所在地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其中约 95% 都位于所谓的发达地区。到 2010 年, 发达地区比例已下降至 83%, 2014 年则为 69%。据估测, 到 2025 年这一比例将进一步下降到 54%。这一数字清晰表明“非传统”国家在全球商业领域的转型与崛起。

麦肯锡公司 (McKinsey & Company) 在各类报告中预测了中产阶级的全球分布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预计到 2030 年, 全球约 66% 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亚太地区。到时, 印度、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将位居前列; 而“传统”地区, 如欧洲和北美, 中产阶级的比例将显著下降。到 2030 年, 飞机制造产业界预计往返于“非传统”地区间的普通航空客运量会显著增长, 其中往返于中国境内各地的客运量增长将最为显著。这些增长是由于商业活动不断繁荣发展, 以及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对于休闲旅行需求

的不断增长。

另一重要的全球趋势是城市化和愈加完善的全球核心城市中心网络的发展。上个世纪, 航空旅行大多发生在世界上设施完备的主要首都城市之间, 但如今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剧变。首先, 越来越多的机场被建在首都之外, 有的是新建的, 有的则是通过翻新以前的军用机场形成。其次, 可能更重要的是, 由于廉价航空公司为寻求更好的价值关联, 这些城市已被提升至国际门户地位。这种新的枢纽不仅带动了更多的休闲旅游, 同时也增加了商业和学生的流动性。新连接起来的城市中心, 凭借着城市劳动力的天然优势, 在这个新的全球网络中也开始重点建设知识社会。预计到 2025 年, 这 440 座全球网络中的新兴城市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 47%, 同时会新增十亿消费者。这个网络将是未来人才公平竞争的一大组成部分, 它同时也需要这些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的人才的参与。

中产阶级除了有钱享受休闲旅游, 在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方面之外, 他们也期望其子女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 我们也预料到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会激增。

事实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数据显示, 根据目前的趋势, 2030 年预计毕业的学生 (25~34 岁) 中, 50% 来自中国和印度, 而欧洲和美国总量所占比例则不到 25%。有可能的是, 未来我们的毕业生将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事或是在在

不同文化背景的地方工作。事实上，即便在今天，由于缺乏对口的国内大学毕业生，欧洲很多公司不得不招收国外毕业生，因此也就形成了具有显著跨文化特色的办公场所。

技术影响

第四个重要的全球趋势是技术的进步。最近，在一项由世界教育创新峰会（the 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开展的对教育专家的调查中，50%受访者预测：到2030年网络在线内容将成为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这个统计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互联网信息正急剧增加，而且发布信息的难度越来越低。电子格式的学习材料便于分发和调整，因此，它深受人们的喜爱并得到了不断发展。同时，电子材料也有利于在有限的校园学习之余创建网络课程联合项目。

与本文讨论相关的另一个技术影响是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奥斯本（Michael A. Osborne）描述的工作两极化现象（job polarization）。他们指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工作性质可能出现明显变化，部分工作将完全由电脑完成。然而，还有很多工作不属于这一类，在这些最不可能被计算机技术所取代的工作类型中，启发式教学法、社交互动、在狭窄空间工作以及创新将会发挥显著的作用。

所有的这些全球变化会塑造这样一个未来：跨文化接触将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因

此，技能、态度和知识都需要具备跨文化有效性，这些也应成为未来学生发展更重要的部分。

高等教育的应对

全球互联城市中心网络的扩大、经济活动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世界中产阶级的重新分配、职业两极化和技术发展等这些关于全球发展的预测，加速构成了一个日新月异的环境，我们未来的毕业生将在这里工作和生活。高等教育机构必须确保未来的毕业生做好充分应对世界挑战的准备。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结果，即具备跨文化能力的国际意识，是这些毕业生需要具备的能力。另外，在国际流动中，他们还将获得所谓的“21世纪技能”的进一步提升。这些会让我们的毕业生对未来拥有更充分的准备。尽管这篇文章提到了许多变化，但人类目前的活动催生出了其他挑战，如全球变暖、水资源和食物分布和分配不均、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以及冲突引发的大量移民。如果全球经济变化不能激发毕业生获得国际意识、实现有效跨文化交际的需求，那么这些其他挑战也必将向前推进这一议程。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竭尽所能打下基础，确保毕业生做好准备迎接挑战。有了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议程，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我们是否应该在小学教育阶段就开始国际化，而不是在高等教育阶段才将其引入。

21 世纪的国际化：融合高校政策与领导力

John K. Hudzik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高级研究学者、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hudzik@msu.edu

高等教育在回应国际化的一系列动因和目的方面遭遇挑战。主流学生、教职工和教师在获得国际视野上面临压力，这些压力涉及所有的院校核心任务并普遍存在于那些国际化贡献者和参与者之中。因此，为了促进更加广泛的国际化，我们需要精心设计且系统化的院校政策及领导力。

目前，国际化的动机包括各种目的和预期成果，包括：获得全球前沿知识并发展伙伴关系、培养跨文化知识和技能、在全球环境中培养足智多谋的公民和劳动力、提高高等教育院校的国际地位以及促进和平和相互理解等。

对国际化结果的预期已从教学延伸到了巩固跨界知识、科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服务使命。当今国际化的利益相关者多种多样，各方对预期结果都有特定的偏好（例如，教师希望获得学术成就、升职机会和声誉；学生和家庭希望得到学识、工作及接触世界的机会；院校领导期望获得资金、提升院校信誉和进行能力建设；政府期望劳动力得以发展并与国际市场接轨。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和资金帮助高等教育实现国际化，但最终是高等教育院校本身决定自己的命运。本文作者在 2015 年发表的《全面国际化：院校的成功之路》(*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stitutional Pathways to Success*) 一文中谈

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成功需要四个相互作用的因素：（一）有效的领导层变革；（二）浓郁的国际化校园文化；（三）战略性包容；（四）关键的行政实践和政策。这四个因素需要相互融合并促进，缺一不可。

扩大领导团队

领导力需要来自上层（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和院长）、中层（主任和主席）和基层（有影响力的教师、职员和学生）。国际化的有效领导力既不能是纯粹的自上而下，也不能是完全自下而上；相反，它应该双管齐下。高层领导规定院校基调，重申学校价值观并协调重点事宜，但国际化的工作和创造力依赖于教师、骨干员工和学术支持部门。

虽然国际办公室可以发挥重要的促进和协调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多样化的领导群体和学校中各类办事处的积极参与，国际化不会具备有朝气。无论其具体形式如何，国际化办公室必须与学校各级领导有效合作。

建立支持性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定义了驱动价值和实践重点。如果没有得到广泛传播的文化的支持，全面且具有战略性的国际化就会受到阻碍。要建立这样的校园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应植根于院校内部上下级的对话交流，从而激励人们把国际化维度融入所有的核心任务之中，包

括理解国际化的含义、重要性、对院校的提升作用及其在21世纪的知识核心。广泛的对话机制有助于每个人在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作用。

参与战略包容

战略包容需要把国际化融入重大院校进程和决策中，这些决策关乎学校使命、价值观、政策和预算规划、院校品牌建设和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包容在领导层过渡、质量评估、课程修订和战略规划等情况下为制度变迁的关键进程提供支持。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化主导这些方面的决策，而是说国际化要完全且自发地融入其中。

实施重要政策和实践

院校案例和相关某些策略方法的文献资料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化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相当重要的政策和做法包括：

定义目标、成功标准和预期结果。对国际化预定目标和结果的明确认识，为引导人们开展行动并定义何谓成功奠定了基础。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定义成功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不同院校在如何定义成功上也有所不同。关键是要发现特定院校的成功动机；如果评估能够体现出实际结果，那就更好了。

奖励成功。那些重要的、有激励作用的行为应该受到重视并予以奖励。学生需要的是课程和入学要求中重要的部分以及对学业和就业有帮助的知识。教师需要的是不断在事业上进步、提升其学术声誉，并得到更多资金和学术参与的机会。院校需要的是提高排名、地位和声誉，并获得支持。与这些目标一致的个人和单位致力于发展实施国际化，他们会受到褒奖吗？如果发展国际化的各种努力在课程设置或个人行动中不受重

视，或只是稍微被注意到，那么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很低；如果这些努力得到鼓励、支持和期许，那么人们的积极性就会增强。院校是否应该奖励进行国际参与和活动的师生呢？

将国际化融入到现有院校使命和双重用途基金中。如果国际化被看作是大学三大传统使命（教学、学术和服务）之外的另一使命的话，它将会被边缘化。如果国际化变为加强现有使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它会得到持续发展。几乎没有哪一所院校可以完全依靠自身而获得足够多的资金来开展国际化。通过把国际化维度纳入双重用途项目和支出以资助国际化的成功例子有很多：如增加现有教师的国内专业知识，把跨境工作和伙伴关系纳入研究重点；参与现有课程；把国际化内容和维度整合起来。

挑战现状，鼓励发展适应性强的行政体系。全面且具有战略性的国际化必然需要组织变革。然而，在大多数组织中，固有的现状和对熟悉事物的依赖性阻碍我们做出改变。但是，国际化导致了课程、研究重点以及和国外合作伙伴建立关系的倾向性方面的改变。与其他国家和文化的院校建立伙伴关系需要适应性，并认可“我们的方式”并非唯一方式；行政政策和做事流程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变革的主要推力是要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和国内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一个开放的院校，以审查政策、程序和规则。

为国际化招募及培养人才。国际化主要由教师和学生来推动，这些人至少要对国际参与感兴趣且了解其重要性。所以，实现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动条件是该院校是否已经吸引或正在寻找这样的人。院校是否致力于在品牌建设、吸引潜在学生以及招聘教师方面发展国际化？此外，这个院校愿意做出何

种承诺以为现有教师参与国际活动进一步提供教育和推动力?

结语

在通向更加全面且具备战略性的国际化过程中,各院校实际采取的方式差异巨大。

没有最好的模式;只能说有几种比较有效的模式。对于一所院校来说,“最好的”模式是适合其特定的文化、能力、核心价值观和使命的。国际化实践必须从内部开始进行,但对领导力和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关注也有助于成功发展国际化。

科研领域的“国际学者”和“本地学者”：欧洲相似的生产力模式

Marek Kwiek

波兰波兹南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Poznan)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院校研究和高等教育政策主任

电子邮箱: kwiekm@amu.edu.pl

国际合作与科研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已在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广泛论述；并且，有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国际科研合作活动的增加有利于科研生产力的提高。国际科研合作常被视作预测高科研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国际科研合作与高于平均水平的科研生产力之间的相关程度，并探究了此种关联性是否存在于所有学科中。调查对象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群体，即国际学者和本地学者。“国际学者”指的是那些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学者，而“本地学者”则是缺乏国际参与的学者。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变革中的学术职业” (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和“欧洲学术职业：应对社会挑战”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Europe: Responses to Societal Challenges) 两个研究项目。主要数据来自 11 个欧洲国家，共计 17 211 个可用数据。

国际化生产力和学术领域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所有的学科领域主要集群中，欧洲“国际学者”和“本地学者”间的科研生产力呈现显著差异。平均而言，与同一领域中没有参与国际合作的学者们相比，那些与国际同行开展研究合作的欧洲学者出版的学术书籍或发表的期刊文章更多。

在欧洲，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学者的比例很高，平均而言，三分之二的学者都参与国

际合作。然而，这中间存在巨大的跨学科和跨国差异。“国际学者”的比例在我们所研究的五大学术领域集群中各不相同，分别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物理科学和数学、工程、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学科（教师培训和教育科学、行政、经济和法律等）。迄今为止，物理科学和数学领域中的学者最具国际化（其中四分之三的学者参与了国际合作），专业学科中则最不具国际化（只有大约一半的人参与了国际合作）。

整个欧洲 11 个国家所有学术领域“国际学者”发表文章的平均数量是“本地学者”的两倍多。在某些学术领域，“国际学者”平均发表的文章比“本地学者”多出约 140%（工程学）和约 120% 以上（物理和数学），而在其他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和职业学），在三年调查期（2005~2007 年的“变革中的学术职业”项目和 2008~2010 年的“欧洲学术职业：应对社会挑战”项目）内，他们较之于“本地学者”多发表了约 70% 的文章。在学术生产率最高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领域，“国际学者”平均发表 8.80 篇文章，比平均发表 4.91 篇文章的“本地学者”多出约 80% 以上。欧洲“国际学者”和“本地学者”间的生产率差异最大的是工程学领域，前者平均发表文章数目为 6.97 篇，而后者仅为 2.91 篇。

在此研究涉及的 11 个欧洲国家中，国际科研合作与更高数量的学术文章发表之间呈

现相关性。统计结果显示，只有在荷兰，即欧洲最具国际化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两者间没有显著的关联性。如果我们假定“本地学者”发表文章的平均数是100%，则这意味着“国际学者”发表文章的数量是240~400%以上不等。国际合作在工程学领域的知识创造中成效最为显著（此领域参与国际合作的学者发表的文章比其他学者平均高出四倍多），而国际合作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职业领域影响最小（此领域参与国际合作的学者发表的文章数量仅比其他学者高出2.5倍）。

跨国差异应用：规模相对较小的爱尔兰和荷兰是国际化中的领军者（平均有五分之四的学者参与国际合作）；其次是奥地利、瑞士和芬兰（有四分之三的学者参与国际合作）。国际化最不明显的是波兰和德国这两个较大的国家，仅有不到一半的学者参与国际合作（约48%）。其余国家可称之为国际化的温和派。

补充说明

有两点值得说明：一是科研生产力和国际合作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关于发文数量。找到了高科研生产力的关联物（如国际合作）并不一定意味着找到了因果关系。国际科研合作一般是由更多产的学者参与并开展的，因为在整个学术系统中，这类学者也正是那些最为多产的学者所寻找的合作伙伴。此外，生产率越高的学者越容易得到更多的国际合

作经费。这类学者的发文数量和他们的科研重要性也有所区别。文章数量不一定表明其科研价值，但在科学领域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人们一般认为：较之于发文量较少的学者，学者的高发文量会带来更多后续研究。

结语

在参与调查的11个欧洲国家的所有学科领域中，欧洲学者的科研生产力与国际科研合作高度相关：参与国际合作的欧洲学者（“国际学者”）的平均科研生产率一直高于没有参与国际合作的学者（“本地学者”）。

“国际学者”和“本地学者”之间的差异已渗透到了欧洲科研领域。某些系统、院校和学者的国际化程度一直高于其他系统、院校和学者。对“国际学者”而言，国际学术界是其参照物，而对于“本地学者”来说，其科研发表主要为国内学术圈服务。

国际化在学术界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分层作用，更多的国际合作往往与更高的学术发表率相关，而那些不参与国际合作的学者，可能会比以往失去更多的资源和声誉。

竞争正成为欧洲科研领域和本土声望的永恒特征。在争取（国内和国际）资源和更广泛学术认同的角逐中，国内论文发表情况可能不再是成功的关键了。高度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合作正在进行，但总体而言，欧洲大学科研国际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确保背景相异高校间合作的公平性

Cornelius Hagenmeier

南非文达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Venda) 国际关系部主任

电子邮件: chagenmeier@gmail.com, cornelius.hagenmeier@univen.ac.za

与国际伙伴合作成为实现国际化的合作方式,这一方式被广泛应用且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大学间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论基础还未得到全面分析和了解。《纳尔逊·曼德拉国际化未来海湾宣言(2014)》(*The Nelson Mandela Bay Declaration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称,国际化今后的议程应集中在“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平等且合乎道德的高等教育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的平等性

虽然平等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中的核心原则,但这一原则还未得到明确定义,并且设定恰当的概念和策略以实现平等的学术讨论还处于初始阶段。在很多高等教育伙伴关系中,不平等与生俱来,特别是在那些实力不均的大学之间。当合作资金是由处于“实力较强”大学中的外来捐赠者所提供时,在相同的条件下,捐赠者仅把资金赠与其中实力较强的院校而不考虑其合作院校,所以不平等性尤为明显。

形式上的平等

根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elian)对平等的理解,即“同样的事物应相同对待”,一般来说,高等教育伙伴关系一般具有形式上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很有必要,当合作双方核心特征相同时,他们会获得平等的结果;但形

式平等的局限性在于,如果合作双方具有不同特征,那么他们之间很难实现平等。

在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中,如果一方投入的资金多于另一方,那么根据其优越的经济实力,在合作的决策过程中,实力较强一方的影响力就会大得多。很多高校偶尔利用这一点寻求竞争优势,特别是当合作伙伴的规模、科研产出、声誉和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形式平等的缺乏会对合作伙伴关系的成功以及可持续性造成威胁,并导致合作伙伴其中一方主导另一方的情况。因其具有较大的经济贡献,在伙伴关系决策过程中,经济实力较强一方所带来的影响力被认为是合理存在的。

本质上的平等

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或至少是公平的,但是在资源不均、实力相异的大学和教育体系之间,如何实现平等与公平仍有待商榷。如上所述,作为高等教育伙伴关系中平等一词的概念基础,形式上的平等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质疑平等是否应该有不同定义,例如,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对平等进行解释的另一种反向理解,即“不相同的事物需依其差异区别对待”。基于这个平等原理产生的实质性概念已被广泛用于人权、劳工和性别话语中。它为完全不同的事物提供了不平等的处理方法,这也许可以用于高等教育中以避免

上文提及的不平等倾向的出现。

对伙伴关系平等性的真正理解为平等共享合作奋斗成果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从而有利于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理解将反映出伙伴关系中各方的差异，并提供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即承认多样性是在伙伴关系中建立平等治理结构的基础。伙伴关系中贡献的本质和数量应根据合作双方各自的实力而定，双方关系应当是互惠的。

为建立确定性并提升平等性，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平等的概念，即明确界定合作伙伴所需贡献的程度。采取实质性平等原理的一个良好案例是2013年南非文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enda)的国际化政策，它根据对平等的实质性理解，把平等定义为“每个合作伙伴都应为合作做出贡献，在考虑各院

校具体情况的基础之上，所有贡献意义均等”。

结语

为了对抗当今高等教育伙伴关系中的不平等和剥削暗流，我们有必要在不同实力大学间的联盟中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概念，这种平等既超越了形式上的平等，也并非停留在实质上的平等中。我们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以获得对现有范例的深刻理解，合理地对推进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真实平等的模型进行概念化。对平等实质性的理解似乎有利于平等模式的建立，它将确保在互利互惠的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中实现真正的平等。

国际化、课程设置与学科

Hans de Wit, Betty Leask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Betty Leask: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教学副校长

电子邮箱: B.Leask@latrobe.edu.au

近十年来,各高校、国家政府和国际/国家组织在实现国际化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主动,采取的举措更具全面性,方式更具多元化和创新性。对于这些实践活动的一些批判性反思,特别是其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带来了具备更深意义和更大影响的国际化途径的探寻。

关于国际化途径的研究显然越来越多地使用诸如“更深刻的国际化”、“富于变化的国际化”和“全面的国际化”等术语。尽管这些术语的数量和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关键在于要言行一致,即表达与实践相吻合。这些术语坚持把国际化作为提高学术质量和创新性的驱动力,同时也折射出人们对确保大部分学生和教职工参与国际化进程并作出改变的关注。此外,在有关当今世界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不平等的问题上,这些术语也可能推动解决方案的发展。在国际化中,那种只关注少数学生或只关心利益的随意方式与上述术语并不一致,且不利于高校在全球化环境下的生存。在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个人和高校都需要多元化视角。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国际教育急需清晰且连贯的方法,解决的是学生发展过程中的认识论、实践和本体论等问题。对学生这些方面的关注可以改变高校的国际化方式和高校的身份认同。

通过课程设置,高校可以把学生在认识论、实践和本体论方面的发展融入到当今学

生的生活和学习中,确保他们为毕业做好准备,并且为未来世界做出积极贡献。近来,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课程设置和学科间的关系问题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下面是关于其中几个问题的简单讨论。

成为全球公民是一个可实现和理想的结果吗?

培养有责任心的全球公民可能是高校影响当地社区和全球社会的途径之一。但我们如何定义作为全球化结果的“全球公民”呢?全球公民需要掌握哪些知识、技能,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我们要怎样在学习项目课程中培养和评估以上内容呢?在民族国家由政治主导、全球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的当今世界,全球公民有可能存在吗?

有人认为,作为国际教育的结果之一,培养全球公民并非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它势必会将一些人排除在外。这可能会带来更优秀的跨国精英,从而进一步增加某些群体的特权和权力。

但当把培养国际公民作为课程国际化的结果来追求时,这些重要的问题却常常被忽略。

人员流动的作用是什么?

人员流动仍是许多高校国际化策略的重

点所在。这部分是由于流动性易于转化为数字、百分比和目标。全国性、地区性以及全球排名都需要可测量的目标。虽然博洛尼亚协议签署国的教育部长们制定的宏大目标已经实现，但仍有80%的学生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出国留学。这表明国际化教育中的“本土”部分也很重要，它不仅关注国际化的学习结果、影响以及质量，同时也关注所有学生的国际化学习结果，而不单单关注少数学生的流动。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大多数高校应该如何转变观念，把对少数精英学生流动的关注转变为对全体学生课程和学习结果的关注、对所有学生流动与否的关注。

环境如何影响课程国际化？

高校的使命、精神、政策和关注点影响着其国际化途径。当地的环境，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为课程国际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国家对于执业注册的认证要求往往重点考虑当地的法规和政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情况为课程国际化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此外，国际环境同样重要。全球化导致世界贫富差距的加剧以及“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其中的主导因素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知识上的：西方教育模式的主导地位、研究问题、调查主体以及如何把调查结果应用于实践。在本国和全球背景下，学科社群是决定教学内容选择、教与学、课程设计方法的驱动力量。他们决定了课程中的知识点以及如何教学并评估学习结果。学科、高校、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因素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影响，促进、阻碍、推动并塑造了国际化的途径，包括定义、教授及评估学习结果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学科内和学科间的课程国际化既相似却又不相同。

如何定义课程国际化？

我们是否可以至少在课程国际化这一概念和其进程的基本特点上达成一些国际（如果不是全球的）共识？这个定义要有足够的包容性，囊括对特有环境和专门学科的解读；这些解读要足够详细，以保证课程中的重要内容得到处理，并涉及所有学生。Betty Leask（2015）对课程国际化的定义涵盖了以下三点：“课程国际化是一个把跨国界、跨文化和全球维度融入到课程内容、学习结果、评估任务、教学方法和学习项目的支持工作中的过程”。

关注点转移

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体现了国际化途径中关注点的转移，从专门化、边缘化和片段化的活动转移到更广泛、多元、综合且具备变革性的过程中去。尽管人们仍相当关注国际化的海外成分，但关注课程本土国际化的强烈呼声前所未有。人们愈发意识到，高校需要加大努力，让更多甚至是全体学生参与到国际化中。但关键在于缓慢转型，并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增加预期的可能性。

国际化本身并不是目标，它是一种提升高等教育教育、科研和服务功能质量的手段。环境会影响开展国际化活动的原因、内容和途经；因此，课程国际化的解释和实施方式在不同学科领域内有其相似点和差异性。没有哪一种国际化模式适合所有的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及学科。

注：本文基于《学科课程国际化的关键视角》的前言（Wendy Green & Craig Whitsed. 2015.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ising the Curriculum in Disciplines*. Sense Publishers, Dordrecht）。

欧洲呼声：本土国际化的新定义

Jos Beelen, Elspeth Jones

Jos Beelen: 欧洲国际教育协会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本土国际化
专家团主席

电子邮箱: j.beelen@hva.nl

Elspeth Jones: 英国利兹贝ckett大学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高等教育国际化荣誉教授、意
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 (the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荣誉访问
学者

电子邮箱: ej@elspethjones

在最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讨论中, 新术语和新定义的不断引入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批评。虽然专家们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他们认为, 阐明本土国际化概念的重要性远大于限制国际化定义的数量。最近, 他们提出了一个本土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的新定义。尽管对本土国际化的定义不能保证其顺利实施, 因为根本问题尚未解决, 但我们还是希望这次的新定义能为其实施带来可能。

对本土国际化持续上升的关注

本土国际化的概念在特定背景下意义重大, 特别是在国际化重点历来是放在人员流动的国家。人员流动对参与者的巨大益处愈加明显, 全世界的国家都试图增加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数量。然而, 人们也意识到, 流动学生在全体学生中所占比例仍然较小, 所以, 本土国际化在为所有学生提供国际化活动上相当便捷有效。自2013年起, 本土国际化已被纳入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的教育政策——《世界图景中的欧洲高等教育》(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之中。可以说, 本土国际化已

获得良好的发展势头, 并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讨论的核心。

在欧盟 (European Union) 成员国的教育政策中, 本土国际化也正在成为一个术语。例如, 2014年, 荷兰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NUFFIC) 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 意在形成荷兰本土国际化的国家政策的基础。

仿佛这一次, 政策走在了实践之后。在荷兰, 76%的高校已将本土国际化课程纳入其政策之中。但从最近《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实时监控》(EAIE Barometer) 发布的数据来看, 在欧洲, 这一数值低至56%。但这不只关乎政策制定。大部分欧洲高校宣称要开展活动以实现本土国际化。近期发布的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调查——《2015大趋势》(Trends 2015) 显示, 64%的欧洲高校都在这样做。

概念迷雾

随着本土国际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 对这个概念的清晰理解显得愈发重要, 人们对概念的一致理解并非是个假设。本土国际化的最初定义可追溯到2001年, 但这一定义几乎没有意义: “除出国学生和教职工流

动之外的任何国际活动”。随着本土国际化已成为一个概念，特别是在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本土国际化和课程国际化的交叉部分存在着歧义。

课程国际化在其他地方也被当作通用概念，且往往被认为可与本土国际化进行互换。虽然这两个概念都包含正式和非正式课程的国际化，但在本土国际化中，人员流动是一个附加品，它是少数学生的特殊选择。

另一方面，课程国际化指的是课程的维度，而不关注授课地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或许包含那些自己做出选择的少数学生的流动，或许指的是跨国课程或其他形式的跨境教育。这两个概念上的模糊不清在调查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实时监控》在有关国际化政策内容的同一个问题上涵盖了这两个概念。

其他实践问题

即便概念迷雾渐渐消退，另一个难题依然存在：如何帮助学者获取学习结果中预期的国际化、设置评估并创设有助于学生达到预期学习结果的学习环境。这就是奠定2015年建立的欧洲质量标签——CeQuInt 基础的系统。这些结果的清晰阐述也相当关键。我们在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发布的第四次全球调查中看到，学习结果的国际化正不断繁荣发展，事实上，这大都发生在院校层面。在院校层面上，把引入国际与跨文化学习当作一项口头承诺简单易行，因为它们并不在评估范围内。真正的难题是在每个单独的学习项目中把国际学习结果情境化，以及支持学者们创造成

果并进行评估。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教育专家和国际化专家的支持。这个新的定义对达成本土国际化的共识有所帮助，也有助于解决上述难题。

本土国际化的新定义是由学者们在2015年发表的《欧洲高等教育：几点反思和未来政策》（*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Between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olicies*）一文中提出，“本土国际化是指，在国内学习环境中，有目的地将国际及跨文化维度融入到全体学生正式和非正式的课程中”。

这一定义强调把国际与跨文化维度有目的地融入课程之中。这意味着随意增加一些国际化元素或选修课并不足以使一个学习项目国际化。它也强调国际化对所有项目中的全部学生的影响，并不只是依靠流动来为学生提供国际与跨文化知识。谈及“国内学习环境”，这个定义清晰指出，本土国际化活动可能会在主校区和正式学习环境中进行延伸，囊括当地的其他跨文化和/或国际学习机会。它可能包括与当地文化、民族或宗教团体共事、运用互助学习系统或其他方式使国内学生和国际学生进行互动、或是在教室里寻求多样化教学。它也可能包括科技推动的流动或是虚拟流动，如通过在线合作式国际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等。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些环境可能会被视为学习环境，凭借对特定学科环境中国际化学习结果的清晰表达和评估，这样的环境将成为实现富有成效的国际与跨文化学习的途径之一。

澳大利亚：课程国际化和“新常态”

Craig Whitsed, Wendy Green

Craig Whitsed: 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 (Murdoch University) 高校教学与学习中心副教授

电子邮箱: c.whitsed@murdoch.edu.au

Wendy Green: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asmania) 塔斯马尼亚教学学院高等
教育高级讲师

电子邮箱: w.j.green@utas.edu.au

“常态”一词常被用来形容现有状态，通俗地讲，就是可接受或还行的状态。但是，正如加拿大创作型民谣歌手 Bruce Cockburn 在 1993 年的歌词中所写的那样，“常态的麻烦往往总是越变越坏”，歌词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它体现的情况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代开端类似。

要对常态有所质疑

在高等教育和课程国际化背景下，可能不是常态变糟的问题，更多的是以一种全新且可能充满挑战的方式，对常态进行质疑，而且要对此做出可能的改变。如果国际教育想要继续保持其重要性，它就必须进行批判性反思，就像我们下面所说的一样。

过去三十年中，技术、通信、科学进步和社会政治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矛盾的是，全球化具有两面性，它既减少又增多了国家和个人的社会期待以及与之相随的各种机遇，它既压制这些期待与机遇却又使其获得解放，在约束它们的同时却又提供了这些期待与机遇。在这一时期，全球化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全新方式影响并塑造着整个世界，这在高等教育领域尤为明显。

正如有的人所言，全球化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促使我们重新考虑高校教与学的

基本原理、方法和实践常态背后的假设。随着全球化变革过程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们更需要有目的地并批判性地反思“新常态”的涵义。《城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对“新常态”的定义是“发生巨大变化之后的现有状态。在某一事件发生后，它取代了预期的、往常的和典型的状态。新常态鼓励人们去应对当前的状况……”。

全球化世界的教与学

世界正走向全球化，这是 21 世纪的现实。然而，少有人理解全球化进程和产物正在或将如何塑造高校的教学。

针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现实，澳大利亚课程国际化国际教育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Curriculum) 特别兴趣小组在墨尔本 (2015 年 7 月 2 日) 举办了一次论坛，主题是“全球化世界中的教与学：课程国际化 (Learning and Teaching for a Globalised Worl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Curriculum)”。会上，墨尔本大学 (Melbourne University) 全球教育研究教授 Fazal Rizvi 做了主题为“课程国际化：新常态下的挑战”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Normal) 的发言，他呼

吁听众重新考虑长期以来的主导观念和假设,因为这些观念和假设在过去三十年中构成了我们对国际学生、国际参与以及课程国际化方法的理解。Fazal Rizvi 指出,这些对世界的霸权假设——它们植根于过去的常态,影响着人们对国际教育的角色、功能和目的的早期理解,也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学生以及他们应如何被传授知识并融入大学体系和结构的早期理解。在澳大利亚,经济理论基础决定着国际学生的招收,其关注点大都是补救性质的。高校和学者们都意识到国际学生多种多样的学习风格,因此采取措施以确保他们安置妥当、获得支持并最终融入新的学习环境中。“课程国际化”政策在澳大利亚高校得到广泛发展,国际内容被纳入到课程教材,文化多样性得到认可;同时,该政策在全球知识经济中,为参与者传播了大量的主流知识(浓郁的欧化知识)和技能,这些都是基于对国际学生所需知识和技能的设想。因此,一种对澳大利亚国际学生提出质疑的倾向开始出现。

Rizvi 认为,尽管这些假设在澳大利亚高校盛行的国际化话语、战略和实践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如今我们应该对“常态”假设提出质疑。

质疑常规化假设

凭借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加上受到斗志昂扬的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数量的增长以及愈发模糊的国界,全球化应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主导的“国际学生”的构成。Rizvi 称国际学生的正常结构折射出政府和大学的政策,并在实证研究中得以体现,它体现出国际学生从“国家人”变为“国际人”的假设。Rizvi 认为,换句话说,这些学生被视为文化白板(*tabula rasa*)。早期实施课程国际化的方法

一般都把国际学生视为少数人群,这些方法正面临着全球化新常态现实的挑战。在新常态中,即使是最偏远的印度(或澳大利亚)乡村未来也可以作为一个本土国际化大本营,在出国留学之前,潜在学员就可以与高校及其所在地建立联系,并获得相关信息。

应对新常态

自1995年 Hans de Wit 和 Jane Knight 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历史和概念视角》(*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Perspectives*)以来,Rizvi 认为新状况已出现,这需要在课程设计上做出回应。这些新的状况包括日益多元化的社区;增多的文化交流;民族、文化和实践的融合;互通有无的新格局;“地方性一夫多妻制”(place polygamy);不断加强的跨国联络能力、转变的公民概念。全球化和数字化以一种深刻而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世界,但高校对此回应缓慢。当今的国际学生与早期的留学先锋不同。如今,Skype 等技术可以让他们与远在家乡、村庄和乡镇的父母和朋友建立快速、持续的联系。尽管一些学生在开始他们的大学教育之前已体验了国际旅游或学习,但所有学生都已通过网络见识过更广阔的世界。推特、微博和 WhatsApp 等网络应用正以一种全新的、激动人心且复杂的方式将整个世界呈现在他们眼前。

课程国际化:新的可能性

在 Betty Leask 2009 年发表的《使用正式和非正式课程增进国内和国际学生的互动》(*Using Formal and Informal Curricula to Improve Interactions Between Hom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一文中,她把“课程

国际化”定义为“把跨国和跨文化层面的知识纳入到教学规划、执行和学习项目结果中的过程”。重要的是，该定义将课程国际化塑造为一个持续过程，通过制定战略使全体学生参与进来并做出改变，使他们“更加意识到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因此，它意味着拥抱改变，即接受变化中的各种可能。此外，在我们2015年发表的《课程国际化的批判性反思：商业、教育和健康视角的叙述》(*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Curriculum: Reflective Narrative Accounts from Business, Education and Health*)一文中，我们认为，为了让课程国际化的变革潜力得以实现，就必须使每个教师（学者）、这些教师教授的学科及其所在高校参与进来并做出

改变。我们希望，在教师与学者参与课程的过程中，是时候在整个大学中去考虑一个全新的“设想中的却还未实现的可能”了。

在现代课程国际化的背景下，常态变糟的趋势并不明显，因为它面临失去意义的危机。在新常态下，每个老师和学生既是知识丰富的，又是“一无所知”的，他们需要互相学习。Michael Singh认为，有知和无知可以在我们的“新常态”教室中实现有效交融：通过承认无知，我们可以凭借文化间的对话和辩论促进知识产出，转而创造出未知的新领域。为保持自身意义，我们需要以开放的思想面对无知和有知，充分设想高度动态及高度互联的“新常态”所具备的丰富潜力，并对其做出回应。

教师与国际化参与：国际化已改变了学术工作？

Douglas Proctor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国际高等教育博士生、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国际教育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Research Committee) 会员

电子邮箱: dproctor@unimelb.edu.au

在国际教育领域的学者、工作者和专业组织可能对国际化的定义各执一词，但他们一致认为，教师的参与是国际化成功的关键。在校际层面，通过国际化的综合战略，学校正积极鼓励广大教师重新审视他们的工作。不过，目前尚不清楚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多大程度上对教师的工作造成了影响及改变。

学术职业的变化

国际化被认为是当代影响高等教育、高校和社区，包括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最具变革性的影响因素之一。教师是影响知识创造、应用和传播的核心；因此，人们预期国际化将影响高等教育教师工作模式，也是合情合理的。

过去25年间，主要有两项关于学术职业的调查，即1992年启动的“卡内基研究”(Carnegie study)和2007年“变革中的学术职业”(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简称CAP)调查，它们试图收集有关教师工作态度的数据，包括一些国际维度的数据。基于所采取的方法论本质，这两个研究都集中在国际化中易于评估的方面，如教师流动模式等。虽然早期“卡内基研究”在国际化层面数据的缺乏不利于纵向研究，但在一些适当的地方，这两个研究之间也进行了纵向比较。

根据2007年“变革中的学术职业”调查，有关学术国际化的主要发现基于一些替代性

指标。这些指标包括个体特征，如出生国家、目前公民身份以及被调查者获得最高学位的所在地等。尽管对这些替代指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得出关于教师流动与迁移的结论并探寻可能的代际变化模式等，但这些指标却很少涉及教师对国际化的看法、他们参与国际化活动的理由，更别说国际化可能对学术工作带来的影响了。

“变革中的学术职业”调查中有一半以上的可获得变量都与学术流动和迁移有关，而事实上，该调查的确对作为国际化载体的教师国际流动带有明显的倾斜性。这也就假设了教师的国际化可以通过他们的流动性来描述，同样也预设了教师的跨境流动是其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师对国际化的反应

抛开教师的国际流动不谈（这已是学术界几个世纪以来普遍认同的做法），各种实证研究试图确认教师参与国际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和障碍。这些研究主要在北美地区进行，它们列出了一系列对教师起激励和阻碍作用的因素，并且已经证明高校环境和学科背景是影响这一领域学术行为的关键因素。

尽管高层领导已被认为是影响教师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向教师阐明国际参与的性质），但是教师参与国际学术工作的许多直接驱动因素则是教师个人或内在因

素,如先前的出国经历或国外学术经历等。教师似乎更易受国际化关注的“实现更好的教育”这一因素的影响,而非经济因素。目前,他们在国际活动中的参与也让他们更加意识到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和益处。

尽管如此,研究还发现了大量阻碍教师参与国际化的个体因素。其中,很多都与高校对国际化参与的政策支持相关,阻碍因素包括学术聘用政策、对教师参与的激励机制、工作负荷和时间管理问题、资金短缺问题、技术支持人员的缺乏和对相关领域专业发展的支持等。而其它阻碍因素则来自个人而非制度性阻碍,如对未来的恐惧、对开展国际合作的犹豫态度,以及因担心同事质疑而不愿对某个特定学科的主流国际范式提出疑问等。

然而,影响教师积极参与国际化的最常见阻碍则是源于对实践中国际化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定义。教师间以及教师与高校间对国际化意义理解的多变性是阻碍教师参与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阻力。

有趣但又不出意料的是,关于教师参与国际化早期研究关注的几乎都是教与学的国际化,而非研究或学术工作等方面的国际化。

虽然文献引用数据分析不断深化,这能衡量教师在国际科研合作中不断变化的数据,但目前很少有学者对这些数据进行宏观分析。同样,如何将教师参与国际科研活动与教学国际化联系起来、国际化的方方面面是否起到了改变学术工作的作用,这些我们也尚未得知。

国际化与学术工作

虽然通过分析科研引用数据,我们可能会发现国际合作中教师工作模式的改变,但早期对教师参与国际化的研究并没有阐述国际化改变或影响学术工作的方式。此外,根据对学术职业调查数据的分析,由于1992~2007年的15年间人口结构和教师的行为变化很小,因此这表明高等教育国际化可能更多只停留在了言论而非真正付诸实践。

但很明确的是,如今许多高校的国际战略在所有领域都设计了一种整体或综合的方法。尽管对于教师是否会主动调整自己的工作以适应国际化趋势以及特殊的杠杆措施是否会对下一阶段教师参与国际化起作用这样的问题仍有待观察,但是这些策略所预设的情境都是教师在国际化上的积极参与。

为国际学生建立一个包容性社区

Rachawan Wongtrirat, Ravi Ammigan, Adriana Pérez-Encinas

Rachawan Wongtrirat: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国际项目办公室
国际教育项目副主任

电子邮箱: rwongtri@uncc.edu

Ravi Ammigan: 美国特拉华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国际学生和学者办公室主任

电子邮箱: rammigan@udel.edu

Adriana Pérez-Encinas: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商学院高等
教育及商业组织讲师、研究人员

电子邮箱: adriana.perez.encinas@uam.es

为了将大学与世界接轨, 高等教育机构开始不断招收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以扩展全球视野、丰富整个大学社区环境。与此同时, 对国际学生人数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国际教育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开展的“Atlas 项目”表明, 2001 年全世界有 210 万名国际学生, 而到了 2012 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 达到 450 万, 这意味着年增长率达到近 6%。在全球竞争的市场份额中, 招收国际学生最多的国家依次是美国 (886 052 人)、英国 (481 050 人)、中国 (356 499 人)、法国 (295 092 人) 和德国 (282 201 人)。虽然这些数字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在制度层面, 国际学生人数的增长却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数量的增加将如何影响高校为这些学生提供服务 and 帮助的能力。

无论是从学位流动还是学分流动的角度来看, 招收国际学生就意味着院校对于国际学生个人发展和成功需要承担责任。作者认为, 国际学生支持服务和积极的国际学生课外学习经历是为国际学生成功建立一个包容性社区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虽然我们可能认为, 某所高校中更完善的国际学生支持和服

务能为数量上升的国际学生群体提供更好的支持, 但事实却未必如此。提供合适服务的挑战是, 尽管在“国际学生”的标签下国际学生数量大大增加, 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学生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国际学生支持服务

提供学生支持服务对发展一个良好的国际学生项目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际学生数量的激增, 为这些学生的成长提供相应的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对国际学生支持服务的成功管理和运营可以检验一所学校对大学国际化和提供优质服务的承诺是否得以实现。正如 Hans de Wit 在 2011 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问题和挑战》(Trends,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一书中所指出的, 国际化本身就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指标, 但它不是唯一的指标。一所学校在意识到招收国际学生这一举动的价值的同时, 它也必须意识到自身的伦理责任, 即为提高国际学生的幸福感并确保他们的成功而提供一系列的支持服务。根据欧盟

(European Union) 2014年的“伊拉斯谟影响研究”(Erasmus Impact Study), 参与伊拉斯谟项目往来学生人数的增加让人们愈发意识到提供支持服务以及简化行政程序的必要性。在许多大学, 这也推动了往来学生支持服务的建立或进一步提高。

现有国际学生支持服务的组织结构各式各样, 并没有一个每个大学都应遵循的最佳模式。一些高校坚信, 如果国际活动都遵循一个统一的国际范式, 那么大学国际化效果最好。而其他学校则认为自由的国际化模式最适合他们的大学和政治环境。抛开组织结构不说, 尽管不同国家和学校都存在差异, 但国际教育活动通常都是一致的。作者认为大学应该考虑三个影响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服务的因素, 即国际教育专家的招聘、项目运营和管理的资源分配以及师资的职业发展。

国际学生课外学习经历

包容性社区指的是一个环境良好的社区, 它为其成员提供一种紧密联系、安全舒适的生活体验, 并为他们带来归属感。参与课余活动可以成为影响国际学生的归属感和成功的一种有效途径。因此, 许多大学特意开展和推动学生参与项目, 目的是为国际学生建立一个包容性社区。作者认为高效的国际学生项目至少应包含两个主要目标: 国际学生参与和保留、国际教育和全球连接。回应国际学生课外活动需求的管理人员应考虑四个要素: 文化和社会参与、教育方面、个人和/或职业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力体验。

在美国老多米尼恩大学 (Old Dominion University)、特拉华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和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 (the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都能够清楚地看到国际学生课外活动项目的例子。这些项目关注国际学生参与和保留, 包括迎新招

待会、实地考察旅行和远足、每周的咖啡冰淇淋联欢会、邻里联谊活动和伊拉斯谟社交活动。这三所高校的教育项目包括新生训练、跨文化沟通培训、学术技能研讨会和体育训练。个人/专业发展项目包括简历写作、时间管理、学习技能、就业选择和撰写研究论文研讨会。全球领导力体验项目包括参与国际学生顾问委员会和获得全球教师辅导的机会。其他项目的重点是国际教育和建立全球性连接, 包括国际艺术节、电影放映和当地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教育项目包括全球咖啡馆、特邀报告、国际教育周、征文比赛和伊拉斯谟项目中的学校课程。在个人/职业发展方面, 活动包括国际教育工作者的报告、大学博览会以及与国际礼仪有关的活动。全球领导力体验活动得到了全球大使计划和学生领导力计划的支持。

结论

只要一个高校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国际学生学习与生活氛围, 它就能创建一个包容性的国际学生社区。最终, 希望通过招收国际学生而与世界接轨的高校还应帮助国际学生取得成功并让他们在学校继续学习, 从而保持国际学生的持续参与。有效的国际学生服务及多样化的课外活动意义非凡, 它们对国际学生的整体体验、发展和成功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注重服务和项目实施与发展的同时, 通过允许国际学生在为其设计的项目中有所投入, 国际教育工作者对学生参与度的重视也显得同样重要。随着经验的积累, 学校获得了更多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 并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服务和课外活动配备更多办事处、分配更多资源。最后, 在评估由国际学生援助机构提供的服务以及筹集未来资金的时候, 国际教育工作者对国际项目和国际学生经历进行严格的评估尤为重要。

沙特学生的对外流动：对国家、学术水平和研究领域方面的综述

Manail Anis Ahmed

巴基斯坦哈比卜大学 (Habib University) 全球资源发展部负责人

电子邮箱: manailahmed@gmail.com

1927年, 沙特阿拉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 (King Abdul Aziz) 送出了最早一批到开罗接受高等教育的六名沙特学生, 自此, 沙特阿拉伯在大学生出国留学之路上不断发展。该国第一所大学直到1957年才成立, 所以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 甚至是现在, 在某些领域, 沙特学生只能寻求海外高等教育。政府和普通公民都已意识到这种需求, 并投入大量资金、相应的精力和努力去培养留学海外的大学生。

沙特奖学金项目

沙特大学生出国留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两项神圣清真寺奖学金项目 (the Two Holy Mosques Scholarship Program) 的监护人问题。这是一个投资数百万美元的项目,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是已去世的阿卜杜拉国王 (King Abdullah) 在2005年设立的, 该项目确定了沙特学生向全球高校对外流动的长期性及活跃性, 目的在于把5万名沙特男性和女性输送到海外高等教育机构。2010年, 该奖学金项目在新一轮的五年发展计划开始时进行了更新, 迄今为止, 通过该项目资助获得教育机会的公民数量已远超预期人数。

沙特政府最近一次公开相关数据是在沙特赫杰里年 (1433~1434), 对应公元2012~2013学年的沙特统计年鉴中。这些数据中包括总体人口统计、健康、社会服务、

交通、通讯、水、能源、劳动力市场等。年鉴中很大部分涉及教育, 提及解决国内外高等教育问题。总的来说, 在2012~2013学年, 有近200 000名沙特学生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 (确切地说是199 285名)。其中, 多达165 908名留学生由政府奖学金资助, 其余留学生则是自费。

在国外的沙特女学生

年鉴提供了男性和女性的统计数据。在留学生的性别分类中, 最显著的一点就是, 大量沙特女性出国留学 (150 109名男性和49 176名女性, 比例近3:1)。每名获得奖学金的女性的男性家属都将得到该项目的慷慨赞助, 这证明了沙特对于女性教育的承诺。沙特阿拉伯文化部门在留学生所在国为这些公民教育过程的每个阶段提供培训与帮助。这个创造性的方式确保了沙特女性在没有激怒宗教或颠覆现状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与男性相同的世界一流的教育。当她们充分享受世界一流的教育机会时, 她们也维护了文化和社会对沙特女性赋予的期待。

留学目的国分类

沙特学生倾向于选择具备相似教育体系的国家, 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同样还有欧洲国家, 如荷兰、德国和意大利, 也有诸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此外, 也有大量的

沙特留学生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学习,如埃及、黎巴嫩和约旦。绝大多数学生预计前往使用英语的国家,美国历来是沙特学生接收量最多的国家,英国其次。

学科领域分类

负责奖学金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lah bin Abdul Aziz Al-Mousa)于2009年反映,沙特国外大学奖学金的目的是“培训和开发沙特人力资源,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成为劳动力和科学研究的有力竞争者,并为沙特的公立和私立大学提供关键性支持”。根据他的说法,通过重视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重要领域并鼓励沙特学生参加这些领域的学习项目,从而确保该目标得以实现。

因此,沙特政府鼓励医疗卫生和工程科学领域的奖学金,其次是信息通信、计算机科学和基础科学。同时,商科领域,如会计、管理、金融、电子商务、保险、市场营销和监管法律等也受到鼓励。然而,这一领域多受到有企业和工业背景的自费学生的喜爱。因此,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最大规模的学习领域是商业和管理,而工程和相关科学紧随其后。第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医学和健康科学,第四是信息学。令人惊讶的是,2012~2013学年,超过7 000名沙特学生选择了人文学科,3 644名沙特学生选择了社会科学,1 496名沙特学生选择了艺术学。然而,悲哀的是,只有少数人参与了教师培训(仅

1 899人),这就是沙特国家教育体系整体教学质量上升缓慢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研究、农业、林业、水产养殖、生产率和制造业研究、科学教育、新闻和媒体研究领域入学人数虽然低,但也表明了沙特在正确方向上已迈出了重要一步。

学术水平分类

在高等教育中,沙特的留学生大部分都聚集在学士学位水平(60%),大约24%处于硕士学位水平,另有5%处于博士学位水平。在全部奖学金获得者中,政府为8%的人提供了奖学金和其他先进的专业培训。其余留学生就读的是专科学位、中级和高级文凭以及其他培训项目。

学生出国留学的影响

大量学生出国留学显然对沙特任何一名公民都造成了社会和文化上的影响。简而言之,这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使沙特发生了变化,同时也正在经历着快速的改变。随着沙特学生回归祖国,企业家精神、新想法和各类新机构急剧增加。员工开始慢慢本地化,沙特公民有望逐渐取代外籍专业劳动力。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奖学金项目的延续。随着阿卜杜拉国王去世以及沙尔曼国王(KING Salman)将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合并,该项目是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前行还是纳入新的重点领域并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实现,我们拭目以待。

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Anna Chamchiyan

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国立技术大学 (Ulyanovsk State Technical University) 博士、学术流动
和国际项目部 (the Department for Academic Mo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 负责人

电子邮箱: a.chamchiyan@gmail.com

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中的现代研究工作充满矛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称, 俄罗斯在世界高等教育学生的绝对数量上排名第二, 拥有全球 40% 以上的高等教育学生, 是高等教育四大国之一 (其他三个分别是美国、印度和中国)。但是, 综合评估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的变化, 尤其是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展相当困难。原因在于资源缺乏, 并且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的目标和设施之间、高等教育国际化实际水平和其竞争力之间, 都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

在 20 世纪,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 (或在苏联时期的苏联高等教育)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的学术结构。如今, 尽管一些大学在某些专业领域仍保持着公认的领先地位, 如物理和数学领域, 但俄罗斯的顶尖大学甚至没有进入世界最好大学排名的百强榜单。为了解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俄罗斯高等教育发生变化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一看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起源和历史。

最初的国际化举措

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跨越了整整 70 年, 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0~1960 年间, 随着世界各国独立运动的兴起, 发达经济体国家通过学术流动、培养国际学

生、开展特殊的教育项目等为前殖民地国家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不仅东方国家如此, 西方国家亦是如此。在苏联, 最显著的例子是建于 1960 年的人民友谊大学 (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 该学校致力于为世界各地学生提供教育。在当时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大部分留学苏联的学生都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 只有 3.2% 的留学生来自北美和欧洲。

苏联时期日益增强的国际化

在随后一段时期内, 即 1960~1991 年间, 国际科学竞赛、系统性的学术交流、大批有才华的科学家的到来、广泛认可的国际科技合作等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它们不仅促进了学术和科学机构, 如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发展, 也促进了国家和经济体的科技进步。太空、核研究和医药及其他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项目就是范例。全球对苏联高校及其科研院所的科研和学术成果的公认使苏联在国际上保持着绝对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 高等教育在国际层面上继续扩张, 带来了一些新的教育输出模式, 如联合大学、学术特许机构和海外分校。在苏联的帮助下, 30 多个国家成立了 66 所大学、研究机构、教育中心和专业研究室。它们根据苏联的教育标准和教材, 借助苏联的学术教职工, 为超过 10 万名学生提供教育。这些

新建的教育机构包括在喀布尔、阿富汗(1963年)、孟买、印度(1961~1966年)、科纳克里、几内亚(1963年)建立的理工大学、缅甸仰光科技研究所([the Rango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据仰光科技研究所官方史料记载, 该机构在原有大学的基础上重建于1961年)以及金边(柬埔寨)的高等技术学院(the Higher Technical School in Phnom Penh)与安纳巴(阿尔及利亚)矿业工程学院(the Mining Engineering Institute in Annaba)。苏联大学建立分校也是常事, 如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Pushkin State Russian Language Institute)在14个国家设立分校, 每年培养上千名俄语教师。1991年, 苏联解体后, 大部分分校关闭, 对伙伴国家高校的协助也终止了。自那时起, 诸如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在许多地区已取代了苏联曾经的地位。

早期的俄罗斯联邦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1991~2010年间。在此期间, 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一种反映。这也导致了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 俄罗斯于2003年加入此进程, 欧洲高等教育统一的观念也鼓舞了世界其他地区。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其他事件一起对改革高等教育体系提出了需求。从各方面来看, 这一时期对俄罗斯高等教育至关重要, 因为在缺乏充足的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 俄罗斯必须处理好国内的现代化问题, 而且还要在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关键转型期适应“博洛尼亚进程”的要求。

俄罗斯高校的国际化集中表现在参与联合研究项目、维护国际合作的现有水平, 并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建立关

系网、创建有效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和联盟替代了有关合作与学位互认的双边协议。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基本问题和国际化战略的关注始于二十世纪末期, 当时, 这种现象已遍布全球并成为现代高等教育背景下的一个客观过程。第三个时期变成这样一个良机: 定义国际化、认识国际化对发展全球知识经济的意义、高校间开始比较与竞争、竞争国际化排名、在一所高校或整个国家体系中成功(或是不那么成功地)尝试构建与管理自己的国际化进程。

近期的举措、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审视现在还是展望未来, 俄罗斯高等教育国际化充满挑战、矛盾和值得期待的方法与可能。它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 为优秀年轻人提供教育、教育输出以及国际排名。目前, 为优秀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的主要途经是“全球教育计划”(Global Education Program), 该计划开始于2014年, 它为至少1500位申请人提供了用于攻读世界一流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教育服务输出是根据“教育输出概念(Education Export Concept)”开展的, 这是2011~2020年间俄罗斯联邦开展的项目, 该项目通过有效的招募策略、现代化的高校设施、英文授课以及大量的在线公开课程, 不仅吸引来了外来学生, 也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学生。提高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声誉是“5-100项目”(Project 5-100)的部分内容, 该项目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强俄罗斯一流高校在全球科研和教育市场的竞争地位。QS认为, 在2014~2015学年, 参与“5-100项目”的高校在36个学科领域的国际位次明显提高, 这也成为俄罗斯将在2020年至少把五所高校列入世界百强名单这一目标的铺垫。

与此同时，当下俄罗斯高校的核心任务是：将国际化变成涉及国际内容的工作的重要基础。换句话说，每所高校都应清醒认识到在本校建立综合国际化进程、制定国际化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意义。带着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传播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目的，课程和

学习结果的国际化也应被纳入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之中，从而使所有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都参与到国际化进程中，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方法以学会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学习、生活及有效工作。

日本学生出国留学新趋势

Annette Bradford

日本明治大学 (Meiji University) 副教授, 研究领域为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

电子邮箱: bradford@meiji.ac.jp

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很重视国际学生的流动性, 把国际学生看作是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主力军, 并把他们放在许多政府举措的中心位置。然而, 近年来, 随着出国留学的日本学生数量急剧减少, 以及主流媒体对日本青年内向型倾向 (对外界漠不关心的态度) 的关注, 很多政府和高校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学生的对外流动上。增加出国留学日本学生数量的举措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这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过去的两年中, 日本出国深造的学生数量节节攀升。

日本留学生及其内向型问题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统计数据, 日本学生出国留学人数在 2004 年创下新高, 达 82 945 人。到 2010 年, 这一数字下降到 58 010 人; 到了 2011 年, 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 仅为 57 501 人。2010 年前后, 关于日本学生有“留学恐惧”倾向, 并“阻碍日本的经济增长”的媒体报道随处可见。这些报告是基于日本产能大学 (Sann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2010 年广泛宣传的调查得出的。该调查发现, 日本公司近一半的新员工不愿意到海外工作。由此, 日本学生被认为是极度保守、不关心外部世界, 且对海外学习不感兴趣的群体。

大部分强调日本年轻人内向性的言论可

能源自过度依赖日本留学美国人数的数据。事实上, 日本在美国留学学生人数的下降速度远超其在其他国家留学人数的下降速度。2004~2011 年间, 日本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下降了 53%。然而, 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的日本学生数量显著上升, 分别增加了 600%、200% 和 41%。这些数字表明了学生流动的转移模式以及学生感兴趣领域的变化。这些数字还显示了日本学生群体乐于接受新的国际体验。

日本大学生出国留学人数的总体下降也模糊了日本国际教育充满希望的新动向。日本学生寻求海外长期教育项目的驱动因素已经减少。如今在日本国内, 国际教育体验明显增多。日本越来越多元化, 既包括国内的生活和学习, 也包括国内现有的高等教育模式。例如,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国际课程, 许多课程都用英语授课。参与这些高等教育的学生更倾向于参加短期出国留学项目, 因此, 许多参与这类海外学习项目的学生并不在日本留学生人数统计之内。

数据和研究报告表明, 日本海外留学生人数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学生观念的问题, 而是因为存在很多不利于学生出国留学的因素。例如, 教育体系没有为学生出国留学做好准备; 经济停滞; 日本高校的过度招生; 校历和海外学分转换等学校方面的限制; 日本企业的招聘情况和偏好——具

有海外经历的学生不占优势，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日本留学生人数的下降。日本学生简单权衡留学机遇和风险后，大都偏好在国内就业的常规做法。

日本青年群体的缩小也常被认为是日本海外学生数量的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查阅一下高校的招生数据，这个说法就不那么真实了。虽然在日本总人口中，18岁的年轻人的比例下降了20%，但入读四年制大学的新生人数却在增加。在2000~2010年间，日本大学生总数上升了5%。

日本学生的看法

关于日本人对出国留学看法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大众媒体的猜测而言，日本大学生对出国留学的态度更加积极，他们渴望获得跨文化体验、提高英语能力、拥有全球视野。最近由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发起的对全国2004名在校生和刚毕业的学生进行的代表性研究发现，45%的学生希望或已经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海外学习。这表明，较之于英国（37%）和美国（44%）的学生来说，日本学生更倾向于海外学习。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学生对海外留学的担忧并非取决于日本独有的文化思维定式。

最近的政策

专注于内向型学生的说辞却成了重启国际学生流动政策讨论的一个有效切入口。日本文部科学省已经对此拨款资助，其他政府机构也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教育体系国际化的举措。2012年，政府在对外流动方面的财政支出有所增加，同时，一些新举措也得以开展，包括协同流动计划、联合学位、学分转化机制和出国留学奖学金。2013年，“日本振兴战略”（Japan Revitalization Strategy）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到2020年将出国留学的人数翻一番，达到12万人。这些举措都意识到了学生的兴趣所在，也把目标设定为通过移除学生在决定出国留学时面临的阻碍以重新推动对外流动。现在，要评估“重塑日本”（Reinventing Japan, 2011年）、“迈向明天！”留学运动（Tobitate!, 2013年）以及“团结运动”（TeamUp, 2015年）等项目的成效还为时尚早。但是，近期留学海外的日本学生数量的上升预示着一种积极的趋势。据文部科学省报告，2012~2013学年，日本有60138人出国留学。同时，根据日本学生服务组织（Japan Stud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发布的另一套数据，这个数字在2013~2014年持续增长。

德国高等教育协调的国际化：广阔视角

Bernhard Streitwieser, Jennifer Olson, Simone Burkhart, Niels Klabunde

Bernhard Streitwieser: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国际教育副教授

电子邮箱: Streitwieser@gwu.edu

Jennifer Olson: 挪威奥斯陆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Oslo) 教育学院博士后

电子邮箱: j.r.olson@iped.uio.no

Simone Burkhart: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 战略规划部负责人

电子邮箱: burkhart@daad.de

Niels Klabunde: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Humboldt Universität) 研究顾问

电子邮箱: nklabunde@gmx.de

过去十年中, 通过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高校的努力, 德国已逐步确定了国际化目标, 并调整其工作重点以成功推动高等教育系统的国际化。这些努力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德国高校的国际排名, 参与人才的全球流动, 增强欧洲公民意识, 促进人口多样化以应对低出生率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挑战。最近, 德国讨论的重点集中在评估德国高校日益国际化的经济效益, 以及国际化对地方和国家经济将会带来的潜在影响。

重心的转变

德国促进者协会 (Stifterverband) 和麦肯锡 (McKinsey) 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表明, 德国关注的是国际学生对德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影响。该报告主张重视高校的学生保留率问题。目前, 在本科学业结束之前, 学生辍学率达到 41%; 而在硕士阶段, 这个数字低得多, 仅为 9%。高校也应考虑如何提高毕业率以进行人才储备, 满足德国未来的人才需求; 在未来的十年里, 国际学生将会为德

国带来 43 亿欧元的经济收入。最近, 叙利亚的几十万难民涌入德国, 其中, 许多难民有先进的教育背景和培训经历, 这进一步激化了如何最充分利用和整合技术移民的问题。几十个德国大学最近宣布, 计划通过授权许可审核的课程, 以安置这批叙利亚难民, 在德国期间, 他们的难民身份不变。

通过直接谈及国际学生对德国经济的影响, 关于国际学生学费长期以来的争论也可能重新出现, 即便德国促进者协会和麦肯锡公司发布的报告稍微提到了这个问题。据对 230 个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 45% 的被调查者支持对国外学生收取学费, 另外 30% 的被调查者不同意这样做, 这个数字比国家选民稍高, 因为国家选民一直投票反对向包括海外学生在内的任何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收费。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高等教育免费政策如何才能在德国长期维持下去。

流动性以及其他事宜

德国是当今世界对国际流动学生最具吸

引力的第五大接收国之一，其高等教育格局正随着外国学生人数的持续上升而迅速多样化。自2010年以来，外国学生在德国高校的数量已经大幅增长，目前为319 283人，而五年前这个数字是244 775。这一数字包含了两类外国留学生：一类是所谓的Bildungsinländer，即通常在德国留学，并在入学之前已居住在德国的外国学生；一类是Bildungsausländer，即在留学德国前已获得了其他国家高等教育证书的外国学生。

目前，德国每年送出三分之一的学生出国留学，这个数字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停滞。今天，超过半数的德国高校（57%）提供英语授课的硕士课程，旨在吸引前来德国留学的国际学生。政府通过为外国学生提供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以使他们留在德国成为长期劳动力。然而，德国国际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仍然是免费的高等教育，这不仅适用于国内学生，也适用于在德国寻求学位教育的国际学生。即便是在其他国家开始引入学费制度或是在已有学费制度的基础上逐年增加学费，在德国，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权利的信念似乎仍将继续保持。

确立目标、调整重心

较之于欧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德国的教育国际化是一个更加协调的过程。这得益于德国国际化五大有力推动者的领导与支持，即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德国研究基金会（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德国大学校长会议（German Rectors Conference）、德国学术交流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以及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近几

十年来，这五大联邦政府级别的组织确立了主要的国际议程并设定了宏伟的目标，这些议程和目标已由相关机构、科研院所、基金会和学术机构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始实施。

联邦、州和院校政策及实践

2013年，由联邦和州教育部长发布的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战略至今仍具有重要作用。该战略确定了九项共同目标以解决与以下主题相关的问题：学生流动，本土国际化，员工发展，国际科研合作，提升学生服务，战略行动框架及跨国教育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很多德国高校随后制定或修订了自己的国际战略，不仅着眼于国家重点工作，如增加流动性、促进国际科研合作、加快课程国际化等，而且还增加了本校国际行政人员数量，或是为外来留学生和出国留学的德国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协助这些战略的实施，2009年，在德国大学校长会议（the German Rectors' Conference）上，各高校与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th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一同提出了“高校审计国际化”的过程。本次审计是一项为期12个月的服务，汇集了一个由院校任命的团队组成的外部专家委员，共同评估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并制定适合各院校独特的人员组成、需求及利益的具体方案。

“卓越计划”

过去十年中，分配给特定目标群体以明确活动的大量公共资金已进一步推动了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提升了对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知。在国际层面，这些努力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于2004年启动的德国“卓

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 该计划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并于2012年进行了更新。在第二轮“卓越计划”中, 这种竞争性赠款把另外的27亿欧元奖励给了45个研究生院、43个卓越集群以及11项院校战略, 用于在国际教育市场支持为构建“世界一流”院校而增多的国际化活动。尽管一些批评人士感叹说, “卓越计划”是对全球排名和国际竞争压力的过度回应, 忽视了院校的多样性和入学机会, 但很少有人质疑该计划在识别一批影响德国的国际认知、提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上的成功。

成功的信号

根据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最近发表的报告, 在11国高等教育体系国际化进程的评估中, 德国被列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公开、公平、质量保证和学位认证等综合标准下, 满分10分, 德国获得了8.4分。在《关于2011/2012年流动性的欧洲质量章程》(European Quality Charter on Mobility of 2011/2012)提及的36个国家中, 德国是唯一满足下列所有目标的国家:(1) 国家、区域战略和举措以及基于政府或政府资助的机构都致力于提供信息及对学术流动的引导;(2) 公开支持基于互联网的信息资源;(3) 公开支持个性化的咨询、指导和信息服务;(4) 参与公开支持的“乘数”项目以进一步提供信息和指导。2014年1月的欧律狄刻报告(Eurydice Report)《建立一个流动性记分牌: 欧洲留学深造的条件》(Towards a Mobility Scoreboard: Conditions for Learning Abroad in Europe)把28个欧盟成员国促进高等教育流动性的政策做了一个排

名, 同时把德国、荷兰、意大利和奥地利单列出来, 因为这四个国家为弱势群体学生参与流动项目提供了最好的财政支持并给予了最密切的关注。

财务和主流挑战

德国虽然拥有一个联邦高等教育体系, 但它在持续推动国际教育上无疑面临着挑战。德国的国家计划已做了很多工作以推动国内国际化的步伐, 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 国家对高校的支持将继续确保高校国际活动的可持续性。第三方资金的高比例及高校在科研和教学上基本经费的下降造成了资金的不平衡, 损害了某些长期的国际活动性。此外, 在某些情况下, 联邦政府的基本投资对国际化努力影响不大。此外, 如前所述, 免费大学教育的可持续性仍是一个重要且悬而未决的问题。

除了这些财务上的问题,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其他观察员提出的挑战仍有待处理。这些挑战包括: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面前确保质量研究、教与学的标准得以保持; 确保那些不能亲身出国学生所学的课程及学习体验中融入国际化元素; 调整高校学生录取程序, 为新生学生开辟新的、更加多样化的入学途径; 通过新媒体和新技术利用新的学习机会。在农村地区高校, 吸引外国人才所需的资源分配和为教师流动增加的服务仍分布不均。最后, 通过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推动网络流动、建设卫星校园、发展联合教学和双学位项目等尚未在各类联邦政策中占据一席之地。为进一步推动德国国际化进程, 为国际化创建额外的监测系统和研究讲座可能是进一步推动德国国际化进程的方法之一, 这

在其他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已开始实施。

注：本文是欧洲议会编著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Research Study on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中

《德国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in Germany*）一文的删节版。原文链接：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5/540370/IPOL_STU%282015%29540370_EN.pdf。

印度作为区域教育中心的崛起

Mona Khare

印度新德里国立教育规划和管理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教育规划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信箱: monakhare@nuepa.org

随着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印度从一个南北合作中心国发展成为一个南南、南北和三方合作的枢纽国家。但是, 日益增加的南南合作被认为是该地区区域组织成立的附带结果, 这些区域组织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东南亚国家联盟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金砖五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印度, 巴西和南非 (IBSA) 之间的三边协议以及 E-9 (教育) 计划, 其中 E-9 计划中的九个成员国 (孟加拉国, 巴西, 中国, 埃及,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 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都已经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联合国人口基金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的支持, 以推动加强教育关系的共同承诺。印度的“向东看” (Look East) 政策以及其他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印度与周边其他具有类似背景和面临相似挑战的国家间的关系。这样一来, 印度不仅成为该地区新兴的经济领袖, 同时其成为学术领袖的潜能也得到了认可。

通过更多的合作、增加学生、研究人员、教师和学者的学术流动性,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印度实施的自由化政策对其有着深远的

影响。为了促进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法规已允许印度高校与国外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并在海外建校。印度高校愈发希望并开始利用富有竞争力的薪酬为短期项目招聘外国高校的专业人才。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有意识地促进课程、评估方法、标准化和认证机制的统一, 以鼓励相互承认学位和学分转移。这一举措在印度近年来崛起为区域教育中心的过程中产生巨大影响。

印度: 历史上的捐赠者

印度与南亚和非洲国家的教育合作可追溯到先前的若干举措, 包括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尼泊尔的教育援助计划、“科伦坡计划” (the Colombo Plan) 中的“技术合作计划” (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Scheme)、自 1964 年启动的“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 (the Indian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Scheme)、“非共体特别辅助计划” (the Special Commonwealth African Assistance Program), 通过这些举措, 印度已为 150 多个亚洲、东欧、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援助。据对外事务部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统计, 印度每年对 ITEC 计划投入约五亿卢比 (1100 万美元), 每年在南部培训 3 000 多人。投入到“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和“非共体特别辅助计划”的

资金自成立以来总计近 20 亿美元。

“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和“非共体特别辅助计划”采用的援助方式相同，但“印度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涉及到了亚洲、非洲、东欧、拉丁美洲、加勒比和环太平洋的 142 个国家以及一些小岛国，而“非共体特别辅助计划”项目的目标国只有非共体国家（目前有 19 个国家）。这两个项目援助包括五种不同的方式：在印度开展人员培训、项目援助、技术援助、游学和人道主义援助。印度为所有与它保持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提供一定的该两项目支持，可通过上述方式转化为援助。说了这么多，作为一种需求方的项目支持，这些项目的工作主要限于能力建设、技术培训/教育。也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印度才开始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支持。

最近的趋势和努力

印度作为学术带头人的潜能随着其国际教育合作舞台的扩大而逐步强化。印度正试图以多种方式利用其相对优势，力争成为一个崛起的区域教育中心。合作高校的新模式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印度开始为作为教育来源国变为留学目的地的形象而放手大干，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印度正尝试通过多种计划吸引外国学生。近年来的以下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印度新方向的敏锐视角：

印度是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直到最近，就国际学生的流动性而言，印度仅被认可为主要来源国，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看到，前来印度的外国学生人数有了显著的增长。2000 年，这个数字仅为 6 988；2011 年增长到了 27 531，2012 年达到了 33 156，在短短一年内增长了近 21%。尽管学生来自

150 多个国家，但来自亚洲的人数最多。“印度 2011~2012 年度高等教育调查”（the 2011~2012 All India Survey on Higher Education）列举了向印度输送留学生的十大国家，它们是尼泊尔、不丹、伊朗、阿富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苏丹、伊拉克、中国和美国。这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共占印度外国学生总数的 6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 displays，大量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国家学生偏好的留学目的地是印度，远高于选择其他外国目的地。这些学生来自不丹（71%）、尼泊尔（19%）、阿富汗（16%）和马尔代夫（14%）。大部分学生到印度是为了攻读本科学位，只有少数攻读博士课程。到印度修读本科学位学生数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印度在过去几年内通过开设本科和高职院校使其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此外，邻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偏小。造成这一增长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地理位置靠近、相似的文化基础以及印度低廉的教育费用。与西方和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印度留学的学费低廉，生活费也较低。

该地区系统的合作关系。尽管印度同样加强和梳理了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但其区域重点却是开拓更大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这体现在印度过去三年内签署的 12 个教育交流项目和谅解备忘录（EEPS/MOUs）。其中，八个是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包括：毛里求斯、也门、塔吉克斯坦、布隆迪、白俄罗斯、特立尼达、多巴哥和韩国。近几年来，教育交流项目和谅解备忘录的数量成倍增长，目前印度共计已与 48 个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其中大都是支持印度成为合作领导人的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

发展区域多国高校中心。这些中心的形成是日益增长的区域合作的结果。在两个最重要的区域协会的支持下成立的两个机构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这两个机构分别是由南盟成员国(SAARC)成立的南亚大学(South Asian University)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的一级院校——圣雄甘地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Mahatma Gandh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or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它们均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

远程教育网。印度最大的开放式大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Indira Gandh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拥有近300个研究中心,位于非洲、中亚和波斯湾大部分地区的38个国家。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私人管理和专业性的机构通过远程教育为外国公民提供网络课程。

海外分校。少数印度高校在海外建立了分校,如比尔拉科技研究所(Birl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迪拜分所,马尼帕尔大学(Manipal University)在迪拜、马来西亚和其他地区的校区,SP Jain商学院在迪拜、新加坡和悉尼开设的分校。事实上,迪拜造就了一些印度知名高校。迪拜南亚裔外籍人士的存在和主办国需求的增长,经常被看作是许多印度分校在迪拜开办多年的原因。此外,据《跨国高等教育观察站》(*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报道,印度在其他国家的海外分校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印度逐渐成为引领海外高等教育的非西方国家,海外已有17所分校。其中,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的印度分校就有十所,在毛里求斯和其他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西方国家

的印度分校有四所。

由于印度高校在该地区广受欢迎,私立和公立大学都在海外设立了很多分校。目前,主要是私立大学正在择木而栖,通过扩大其地域范围来增加高等教育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收取的费用一般更高,而事实上,由印度私立大学提供的海外教育的快速增长表明,非印度学生愿意支付高额费用以获得印度学位。

通过短期课程/暑期学校进行对外参与。

为了给其他国家的本科生提供学习机会,印度政府资助的“连接印度”(Connect to India)项目已启动,旨在通过青年学生提高国际声誉。从2014~2015学的年6~7月开始,被选中的声誉良好的公立大学通过暑期课程的形式开始在不同学科开设短期课程。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世界学生对当代印度丰富的艺术和文化遗产以及经济技术的进步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该项目将包括参观历史名胜、通过参与文化项目进行社区互动、参与瑜伽课程等。

非印度高中学历认证。鉴于大部分前来印度的学生都有意就读学士学位课程,印度政府已经实行了与世界上最普遍的教育体系一致的高中教育体系并继续丰富该体系,以使海外学生更好地进入高等教育。

在过去的88年中,印度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Indian Universities)的评估部门一直参与提供与外国学历文凭相当的印度学历和文凭认证工作。此项工作基于认证国外大学资格的评估标准,该标准来自于项学生/教师交流的传统教育交流项目中的双边协议。该项目已持续多年,其培养的学生和教师人数持续增长。

结语

目前,印度高等教育在该地区的受欢迎程度不断增长,这是印度巩固其新获得的区域教育领导地位的恰当时机。从一个本科教育中心转变成为一个硕士、博士教育基地,将有利于印度成为知识创造行业中的佼佼者。印度通过开设南盟、东盟和其他区域的研究中心、促进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试图吸引更多学生前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印度在加强区域教育联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于大部分国家在这些领域中还处于发展阶段,或是其高等教育领域规模较小,所以,印度应探索如何更多地借助信息和通信技术以接收

邻国更大的学生群体。

全球教育界需要和谐发展,所涵盖的领域包括:提升定义和实施学习成绩标准化/认证/评估的能力、提高基本计算能力和英语语言能力、课程开发和创新能力和完善教学材料、重视和提高课堂实践包容性。由于亚洲和非洲年轻人的就业能力差距相当明显,因此,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成为印度学术领导力发挥积极影响的又一方面。为使这一切成为现实,并使印度对其邻国具有比较优势,它需要有战略性地推出具有长期目标和具体阶段性成果的长远计划。

法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历史概览

Guillaume Tronchet

法国巴黎 20 世纪社会史研究中心 (the Paris Centre for 20th Century Social History) 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gtronchet@gmail.com

对于法国的许多政策制定者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新课题。法国政府发布于 2015 年 1 月的一份报告这样总结“是时候对国际化进行投资了”。2010 年，法国精英院校代表大会 (Congress of the French Grandes Ecoles) 组织者指出“这是法国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人们很健忘，他们已经忘记或者根本不知道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中叶间，法国高校是国际化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当初毫不落后于美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这又如何解释呢？而历史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法国高等教育政策目前的一些趋势呢？

从地区走向世界

在 19 世纪，全球学术界被德国大学的模式深深吸引。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尤其是在普法战争 (Franco-Prussian War) 后，法国新成立的第三共和国 (Third Republic) 的精英为了能够吸引前往德国的国际学生和学者，他们决定投资高等教育。1896 年，通过把艺术、科学、医学、法律等现有院系组合在一起，法国建立了 15 所公立大学，它们在国际学术事务中拥有自治权。

当地政策举措也至关重要。为了增加学生的人数，在当地大人物——如想要发展当地旅游业并获得其他商机的市长和商务部地区商会等——的帮助下，法国大学兴起了“学

术外交”，这正是我博士论文中所提及的。“学术外交”需要：进行营销活动以宣传法国大学 (通过手册、海报、国际媒体中的广告等)；为国际学生提供法语及文化课程；开办国际暑期学校 (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格勒诺布尔大学 [University of Grenoble] 在 1899 年举办的暑期学校)；开设针对国际学生的特殊学位；开设出国留学奖学金；设立新的海外分校等。

在建立分校方面，里昂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yon) 在贝鲁特建立一所法学院之后，在中东地区活跃起来。同时，巴黎高校到南美开设分校，格勒诺布尔高校到意大利开设分校，波尔多和图卢兹高校到西班牙也开设了分校。到了 20 世纪初，法国的文化和科研机构逐渐在佛罗伦萨、马德里和圣彼得堡建立起来。

高校自治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 后，正如阿特巴赫 (Philip Altbach) 和汉斯·迪威特 (Hans de Wit) 在近期发行的《国际高等教育》期刊中指出，国际学术关系的发展得益于日内瓦国际主义的兴起。法国在国际学生市场迅速占据领先地位：1931 年，法国涌入了 1.7 万名国际学生，这个数字约占当时全球国际流动学生总数的 20~25%；而美国只有 9 000 名国际学生，德国约有 7 000 名，英国有 5 000 名。法国高校国际学生比例达

学生总数的25%。在某些大学,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80%,如1930年的鲁昂大学(Rouen University)。

与此同时,政府参与越来越多。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首次进行干预,并逐步使学术外交国有化。1920年以后,法国外交部(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也开始发挥作用,开展“文化外交”以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法西斯国家进行抗衡。正如我在博士论文中指出,一方面,学术外交的参与者之间出现了频繁冲突;另一方面,文化外交的参与者之间也产生了冲突。高校保持自主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法国的国际学术政策慢慢处于政府文化外交的控制之下。

历史重负

20世纪下半叶并没有改变这一传统。法国行政部门内部不断发生冲突,一般存在于高等教育机构或外事办公室参与者之间。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非常复杂,先是新成立的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想要涉足文化外交,然后是非殖民化后成立的合作部(Ministry of Cooperation),它负责法国前殖民帝国时期学生的奖学金问题。最后,许多政策常常在制定之前就开始颁布。2010年,一个独特的国家机构——法国校园(Campus France)成立,主要负责国际学生流动与法国海外高等教育的推动。这可以看作是学术外交的一个新开端。

法国政府和高等教育均与公务员体制密切相关,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校可以享有怎样的国际自治呢?所有公立高校的学者招聘和学生入学政策都由政府规定,而这些政策并非都有利于国际化。例如,关于学者招聘,在1968年《埃德加福尔法》

(Edgar Faure Law)颁布以前,外国学者不能就职于法国普通的教学岗位;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法国高校无法留用逃离纳粹主义的德国学者的原因所在。尽管近年来,国外学者在法国全部新员工中所占比例的年均增长达到了18%,但这仍是不常见的。2004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发布的数据,国外学者在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比例为7.5%,与美国(30~40%)、瑞士(35%)、英国(20%)和挪威(10.5%)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关于国际学生录取,基于对法国和外国学生非歧视原则的“共和共识”,自1914年以来一直保证了对法国和国际学生征收的同等数额的学费,这一事实有助于增强法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法国高校无疑仍深受政府移民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在2011~2012年间停招海外学生,其带来的影响正如法国政治科学家所讲的“外国留学生的结束”。

中央集权的政府、政府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分歧以及偶尔颁布的限制性移民法都严重阻碍了法国高校的国际创新。自20世纪70年代起,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也造成了如下的历史传统: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转变已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私立院校,特别是更适合全球化发展并在资助海外分校建设方面更为积极的商学院。根据跨境教育研究小组(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的调查,法国在海外约90%的分校都是私立院校。与国际化不同的是,全球化显然不是一个“新挑战”,它使法国高等教育面临抉择。重获曾经的历史地位可能是其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